



东北作家群
小说选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02 号

东北作家群小说选

Dongbei Zuojiagun Xiaoshuo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30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3}{4}$ 插页 1

1992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20

ISBN 7-02-001394-5/I·1266 定价 7.55 元

前 言

王培元

祖国的东北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三十年代，这块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的土地，养育了她的优秀儿女的文学代表：东北作家群，其成员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李辉英、舒群、罗烽和白朗等。

东北作家群的诞生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准确地说，这个作家群体形成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上海文坛。茅盾说过，“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很出了一批有才华的东北作家”，他提到了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和骆宾基等人。^①李何林先生也曾指出：“‘九·一八’后，出现了一批东北作家，如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端木蕻良、李辉英……”^②王瑶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中，专设了“东北作家群”一节，这大约是学术界对东北作家群最早的概念界定与专门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三十年代，甚至更早，一些东北籍作家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地崭露头角，他们中有著名的沉钟社社员杨晦和创造社元老、中国诗歌会的中坚穆木天，还有齐同、陈辛劳、师田

① 茅盾《抗战前夕的文学活动》，《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② 李何林《左联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新建设杂志社1951年出版。

手、白晓光(马加)、李满红等人,但是,他们不属于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群由孕育到诞生,经历了一个过程。可以说,三十年代初的哈尔滨是培育东北作家群的文学“摇篮”,除少数人之外,大部分作家都是由这里开始走上文坛的,后来,他们陆续汇聚上海,逐渐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的格局。

萧军和萧红一九三二年在哈尔滨结为伴侣,第二年秋天他们合作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跋涉》,受到东北文坛的重视。一九三四年六月,萧军、萧红被迫别离“荆天棘地”的哈尔滨,由大连乘船到青岛,与先期到达的舒群会合。在那里,他们分别完成了开手于哈尔滨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和中篇小说《生死场》。同年十一月初,他们抵达上海,得到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一九三五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以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的作品”,这两部小说“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①

曾与两萧一同在哈尔滨从事进步文艺活动的舒群、罗烽和白朗,也于这一年和下一年先后流亡上海,全力投入抗日文学创作。他们的作品,如舒群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等,在当时都曾发生过一定影响。

李辉英一九二七年从故乡吉林到上海就学,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丁玲主编的左联刊物《北斗》上,他发表了以反日爱国为主题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是出现于上海文坛的第一篇东北作家表现抗日主题的小说。一九三三年三月,李辉英又在丁玲的帮助下,出版了长篇小说《万宝山》,茅盾曾经撰文予以评介。

端木蕻良一九二八年告别家乡辽宁昌图到天津读书,一九三二年曾回乡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不久又前往北平,加入北平

^① 景宋《追忆萧红》,1946年7月1日《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

“左联”。次年在与鲁迅先生的通信中受到激励，着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书成后，受到郑振铎的嘉许。一九三六年初他到了上海，并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他的短篇小说《鹭鹭湖的忧郁》，由郑振铎推荐给《文学》刊载，另一个短篇小说《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经鲁迅转到《作家》发表，茅盾也热心帮助他联系印行《科尔沁旗草原》。

骆宾基是东北作家群中最年轻的作家。“九·一八”事变后，他辗转于山东、北平、哈尔滨等地求学、谋生。《八月的乡村》在沪出版的消息使他受到莫大鼓舞，一九三六年五月，他从哈尔滨来到上海，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当作品写到一半时，他曾向鲁迅先生写信求助，但重病中的先生已不能为他看稿，小说完稿之后，茅盾和王统照都很赞赏，并积极协助出版。

一九三五年，东北作家在上海文坛的迅速崛起，虽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尚未呈现出一种群体的面目，除两萧发表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等作品外，还有李辉英在继续发表一些作品，罗烽则刚刚开始发表少量作品。东北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步入文坛，是一九三六年。这一年，上海的文学期刊《作家》、《中流》、《文学》、《光明》、《海燕》和《文学界》等，比较集中地刊载了两萧、端木、舒群、罗烽和白朗的作品。萧军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以及散文集《绿叶的故事》，萧红出版了散文集《桥》，舒群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上海生活书店还专门出版了收有李辉英、舒群、罗烽和白朗等人的作品的《东北作家近作集》。上述事实充分表明，东北作家群于本年正式形成。

“七七”事变之后，东北作家相继离沪，经过一段流离颠沛的动荡岁月，他们大体分布在两个不同的地区，萧军、舒群、罗烽和白朗陆续到了延安解放区，萧红、端木、骆宾基则辗转漂泊于重

庆、桂林、香港等地。漂泊不定的战时生活环境，使他们的创作发生了某些变化，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写了反映内地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如萧红的长篇小说《马伯乐》、端木的长篇小说《新都花絮》、李辉英的长篇小说《雾都》和舒群的中篇小说《莫云与韩尔漠少尉》等，同时，他们仍继续创作了一批反映东北地区社会生活的作品，如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和骆宾基的长篇小说《幼年》等，这些作品更明显地表现着东北作家的创作特色。这一时期，他们在各自的文学创作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艺术探索，采摘了丰硕的文学果实。令人痛惜的是，这个群体最有才华的女作家萧红于一九四二年不幸病逝于香港。四十年代中后期，东北作家群逐渐解体。

在生活经历、创作题材和艺术特色等方面，东北作家群的成员存在着大致相同的特点，具备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基本规模和主要特征。但是，由于他们并不是自觉联合起来的，没有统一的艺术准则和创作纲领，相互间缺乏紧密的组织联系，缺少在思想、艺术方面的彼此切磋和共同追求，也没有公认的代表性作家的创作或理论作为群体的艺术楷模与美学规范，抗战爆发后他们各自的生活道路又不尽相同，创作实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东北作家群是一个在思想上、艺术上未能获得充分发展的不够成熟的文学流派^①。

二

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是多方面的，涉及各种体裁，但能够

^① 严家炎称之为“准流派”，参见《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真正代表其文学成就的是小说创作。

他们的作品以色彩浓重的笔墨，粗犷雄健的力度和热烈激愤的情感描绘东北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集中、鲜明、强烈地揭示出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这是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突出特征。他们都是东北籍的作家，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首先在他们的生活中和心灵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国恨、家仇和个人遭际，在他们身上最早得到了比较高度的统一，因而在民族矛盾成为现代中国的主要矛盾的紧要历史关头，他们的小说创作较之国内其他作家，都更为敏感、更为及时地反映了历史时代的这一急剧变化。他们带着自己的刻骨铭心的切身感受，以更真挚强烈的爱国热情，真实、具体地反映了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血泪和苦难，描写了东北人民为保家卫国而进行的悲壮斗争和英勇反抗，突出表现了他们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不可征服的民族伟力。

侵略者的大炮和刺刀，首先给东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从神奇的白山黑水到辽阔的草原牧场，从莽莽的林海到三江平原的黑土地，到处流淌着血和泪，到处弥漫着硝烟与炮火，悲愤的东北作家群的成员用他们的文学镜头，真实地摄下了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的苦难。在萧红眼里，这片失去的土地是东北人民的“生死场”，敌寇的掳掠烧杀，使田园荒芜、尸横郊野（《生死场》）。舒群的小说《孤儿》表现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选入本书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和另外一篇小说《邻家》，则真切地抒写着亡国的痛苦和悲伤。罗烽更是“常常悲愤的描写敌人的残酷”^①，他曾把笔伸向日伪统治的最黑暗的角落（《狱》），

^① 周立波《一九三六年的小说创作——丰饶的一年间》，1936年12月25日《光明》第2卷第2号。

还愤懑地控诉了侵略者洗劫村庄、残害平民的兽行（《荒村》），在收入本书的《呼兰河边》里，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简直令人发指！

鲁迅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写信回答萧军的提问时指出：“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可以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便是真正的“斗争的文学”。描写东北人民在侵略者制造的灾难和痛苦中的民族觉醒和奋起抗争，是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十分突出的内容。最早出现于上海文坛的东北作家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宝山》，取材于当时震惊中外的万宝山事件，作品反映了伊通河畔的农民举行的反对日本人强行垦荒掘沟，保卫田园的武装暴动。萧红描写了哈尔滨附近乡村农民沦陷前后的苦难生活和觉醒斗争（《生死场》）。萧军则正面表现“中华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在磐石地区同日伪军队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浴血苦战（《八月的乡村》）。骆宾基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反映了活跃在明朝边境线上的一支抗日游击队的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端木蕻良在《大地的海》里，描绘了莲花泡农民自发开展的反对日军修筑公路的悲壮斗争，端木蕻良的《浑河的急流》，勾画了浑河岸边的猎户对伪满当局的勇敢反抗。出现在舒群的《萧苓》中的，是奋勇展开不屈斗争的爱国学生的形象。

抗战的最后胜利“不能不从抖去阻害民族的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而得到”，^①端木蕻良十分赞成胡风提出的这个观点。并非所有作者都能具备这种清醒而深刻的眼光。有了这种眼光，在表现民族的政治对抗和军事斗

^① 参见端木蕻良《寄在战争中成长的文艺火枪手们》，1937年11月16日《七月》半月刊第1集第3期。

争的时候，大概是不会忽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社会历史基础和思想文化背景的。而这恐怕是影响其作品思想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大地的海》、《边陲线上》，以及收入本书的《丰年》（李辉英著）、《鳏夫》、《马的故事》（萧军著）等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封建传统观念与小农思想意识，阻滞着农民及小有产者走向民族觉醒和反抗斗争的现实，分别刻划了二里半（《生死场》）、金合（《鳏夫》）、孙家父子（《八月的乡村》）、杨德（《马的故事》）、艾老爹（《大地的海》）、刘房东（《边陲线上》）和孙三（《丰年》）等背负着重重的精神负担，艰难地挣扎奋起的老中国儿女的形象。如何准确把握和深刻描写民族的政治独立与精神解放的关系，东北作家群给人们留下了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课题。在我看来，曾在当时发生过很大影响的《八月的乡村》，由于作者把艺术重心主要放在截击、攻袭、撤退、扩军等军事斗争的外部场景的描绘上，未能更充分、更有力地着墨于作品内部思想空间的拓展和发掘，因而便不能不对作品的艺术生命力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害。“生死场”直接描写抗日的后七章，艺术上明显逊于前十章，而且这两部分之间缺乏有机的内在的精神联系，农民对于生的坚强与对于死的挣扎的生命力，向抵抗侵略的民族力量的转化，显得缺少合乎生活逻辑的必要历史过程。后来萧红大约觉察到了这些问题，当聂绀弩谈到《生死场》表现了“不自觉的个体到英雄的集体这一从量到质的改变”时，并没有得到她的明确首肯。^①类似的问题还见于《万宝山》和《边陲线上》等作品。

在中国文学史上，反帝爱国文学是伴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

^① 参见聂绀弩《〈萧红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而产生的。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反帝。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如小说《官场现形记》、《罌粟花》和《狮子吼》等，或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虎狼之心，或讴歌中国人民抗击外侮的正义行动，或描写华侨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悲惨遭遇，或抒发对于清王朝丧权辱国的悲愤情绪与渴望救国济民的强烈激情，都反映出反帝爱国的鲜明思想倾向。但是，由于时代历史的局限，近代文学的作者们既不可能深刻认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也不可能清醒看到人民群众是反帝的真正强大力量。

现代文学以近代文学所不可能有的一种新的姿态，表现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五四时期反帝题材的作品不但为数很少，而且较为缺乏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广阔的社会历史意义。在有的小说中，对帝国主义的揭露尚停留在表层的生活现象上，未能从深切的生活经验和独特的心灵感受出发加以表现。反封建文学，在五四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作家主体的艺术选择。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帝爱国思想的外部形态往往面目迥异、各有不同。从根本上说，中国人民的一切斗争与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息息相关的，这就决定了现代中国文学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内在的深层的而不是外在的表面的联系。有的研究者注意到，“五四”新文学的主将鲁迅并没有创作过反帝题材的小说，这一方面是因为鲁迅认识到，向帝国主义的哀求不能换得一掬同情之泪，向帝国主义的抗议也不会赢得他们的丝毫让步，“要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图谋自己的生存，首先要咬紧牙关战取自己的进步。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把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满腔愤懑全部地倾入到对

中国封建势力的怨怒的攻击、愤怒的鞭挞中”。^①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要求和鲁迅的自觉追求，都导向了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发端的反封建的文化启蒙运动。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会感到鲁迅小说中最深挚、最基本的因素，便是无法阻遏的浓烈而深沉的反帝爱国激情。恰如周扬所说，“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在中国保有不可分离互相依附的关系，因此反封建的文学常常包含了反帝的意义”。^②

“五卅”运动以后，反帝题材的作品逐渐增多，但依然缺少佳作。“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终于出现了一个“反帝文学的高潮”。^③当时，抗日救亡成为每个中国人必须首先回答的时代课题，广大作家以强烈的爱国热情，纷纷投入抗日文学的创作，写出了大量的反映抗日图存的作品。但总体来看，比较成功的是那些及时反映前线军民战斗生活的通讯报告作品，而小说在艺术上大都比较粗糙，普遍存在“‘新闻记事’小说化”的倾向，^④长篇小说《义勇军》（林箐著）和《齿轮》（铁翰池著）便是如此。还有的作者本来不了解东北沦陷区，也写了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如艾芜写出了《咆哮的许家屯》。正象胡风当年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作者不熟悉他所要描写的题材——人物和抚育这人物的环境，那他的描写本领即令很大也无从施展，他的‘热情’即令很高也会成为浮在纸面上的东西，《咆哮的许家屯》就是例子。”^⑤历史急切地呼唤着真实有力的抗

① 王富仁《透视整个社会现实的最佳角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辑。

② 周扬《现阶段的文学》，1936年6月25日《光明》第1卷第2号。

③ 周扬《现阶段的文学》，1936年6月25日《光明》第1卷第2号。

④ 茅盾《“一·二八”的小说》，1934年4月1日《文学》第2卷第4期。

⑤ 胡风《南国之夜》，《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日文学。在这种情势下，时代把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迅速推上文坛。

人们在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第一次看到了东北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英勇斗争”，“当时在民族危机下面的全国人民苦闷愤恨的心情，这才通过文学形象大大地吐了一口气”。^①东北作家群最早描写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把我国反帝爱国文学创作推向一个新阶段，改变了现代文学创作中正面表现反帝斗争，特别是武装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作品比较贫乏的局面，开辟了现代文学题材的新领域。人们从东北作家群的小说中获得的特殊的审美认识和艺术感受，是其他抗日小说所不能够提供的。他们不像巴金那样热烈歌颂人民群众的高涨的爱国情绪（《火》三部曲），不像老舍那样由衷赞美普通市民的坚贞的民族气节（《四世同堂》），也不像马烽、西戎那样着力描写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吕梁英雄传》），而是突出表现东北人民的雄强、犷悍、勇武的精神气概，火山爆发般的不可遏抑的反抗斗争，摧枯拉朽的滚滚抗日洪流。在抗战文学的宏大合唱中，你可以清晰地听到东北作家群的独特声音。唯其如此，东北作家群才会以一个卓然特立的文学群体的面貌，令人瞩目地登上现代中国文坛。

三

清人姚鼐曾经谈到文章有所谓“阴阳刚柔”之别，他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

^① 胡风《我与萧军》，1984年4月25日《北京晚报》。

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阔；其于人也，澀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①西方美学家对于美的类型，也有“崇高”(sublime)与“优美”(grace)的划分。学术界有人把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群体风格概括为崇高和阳刚，而我认为，对于东北作家群来说，这只能是一种大体一致的美学风格而已。说它大体一致，是因为这风格并不能涵盖所有作家作品，在有的作家那里比较明显、突出，如萧军和端木蕻良，在有的作家的少数作品里有某种程度的体现，而在另外一些作家作品里则表现得不那么集中和鲜明。本来东北作家群就不是某种美学风格的自觉组合，不像有的自觉结成的文学流派那样能够形成集中、统一的艺术倾向。即便如此，对他们的雄健、刚劲的风格进行艺术分析，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独特的人文历史地理环境，使东北具有不同于内地的特殊地域文化风貌，这不仅在于寂寥荒漠的土地、苍莽雄浑的原始森林、蜿蜒起伏的山川和飞雪飘飘的漫长寒冬，而且更在于粗犷、强悍、刚直、豪爽、沉实的人民。这些因素必然给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作家的艺术气质以潜在影响，他们的作品洋溢着这块寥廓广漠的土地的浓郁气息，你从中感到的正是那种雄劲、粗犷的阳刚之美。东北作家群不像致力于表现中原宗法制乡村社会的田园风味的废名，常常以翠绿为基色着意描绘竹林茅舍、菜园菱荡的恬静秀丽的景致；也不似擅长描画湘西边地朴野的民情风

^① 转引自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6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习的沈从文,喜欢用水一样明亮碧透柔和的色调涂染画面。一般说来,他们往往以苍劲浑茫、粗犷奔放的格调,浓墨重彩地勾勒东北地区雄阔的草原、广漠的土地、奔腾的河流和苍莽的山林,从而呈现出强劲粗犷、雄健有力的美感。

端木蕻良曾说:“我写的都是一些关于土壤的故事”,①“土地是我的母亲……我是土地的族系”,②“我活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的”③。恐怕没有第二个现代小说家像端木蕻良这样狂热地诗意地描绘土地,他的作品展示了一幅幅充溢着雄深的伟力的大地的图画:《科尔沁旗草原》铺开了绿浪无际的原野,《大地的海》绘出了黑色的浩瀚沃土,《大江》更把大地的幅员从东北山林扩展到长城内外、大河上下。萧军在《绿叶的故事》序中说过,“我是在北满洲生长大的,我爱那白得没有际的雪原,我爱那高得没有限度的蓝天;我爱那墨似的松柏林,那插天的银子铸成似的桦树和白杨标直的躯干;我爱涛沫似的牛羊群……”。出现于他的笔下的是“具有坚强的性格的自然”,④宁静的田野、丛密的桦木林、茂盛绊人的狭叶草、野蒿和野藤,以及在谷底迂曲伸展的小溪(《八月的乡村》),散发出东北大地特有的原始的“野味和生味”⑤。骆宾基的作品则展示了边陲线上一派宏伟壮阔的北疆风光(《边陲线上》),入选本书的《乡亲——康天刚》更是出色地勾画出遗留着冬季白雪的重叠的高峰峻岭、一色是草原的峡地宽谷、流溢着木材的芬芳的房屋、飞

①②③ 《大地的海》后记,《土地的誓言》(1941年11月1日《时代文学》第5、6期合刊),《我的创作经验》(1944年11月《万象》第4卷第5期)。

④ 刘西渭《八月的乡村》——萧军先生作,《咀华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2月版。

⑤ 萧军《八月的乡村》再版感言。

驰的雪车和奔跳的狍子群，色彩浓烈而气势恢宏。

东北虽然很早就有满汉等民族的人民在那里生息繁衍，但是居民人数一直很少，直到清朝末年，才有大批山东、河北移民迁入。正如端木蕻良所说，东北人民“有过一个时候用他们的耐苦和勤劳挖掘出他们发光的日子，活得像一盆火似的。很像美国西部的人们和死亡迫害奋斗，开发了现在的加州一样，所以有许多人都说东北的祖先是Pioneer（拓荒者——引者）”。^①与沈从文笔下的那隅未蒙教化的边地湘西相比，东北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处女地。闯关东的冒险性经历，筚路蓝缕的垦荒创业生涯，使他们面对的社会和文化约束相对薄弱，精神相对自由，个人选择的天地较为广阔，自然环境所形成的挑战也更严峻，由此而熔铸了东北人那种特有的精神气质。端木蕻良从故乡农民的身上，“感悟到人类最强烈的求生意志”，他在《科尔沁旗草原》后记中写道：“我每当看到那戴着貉绒大风帽的车老板子，两眼喷射出马贼的光焰，在三尺厚的大雪地里，赶起车，吆喝吆喝地走，我觉得我自己立刻的健康了。我觉得人类无边的宏大，我觉出人类的无可形容的美丽”。萧军也说过，“我家乡那地方，地属山区，民风是很闭塞、慊悍的。一般并不崇尚读书。当军官或‘红胡子’（土匪别称）是一般怀有野心的青年所向往的理想”。^②出现在东北作家群某些作品中的人物，正是端木蕻良和萧军所说的这种雄强犷悍、蛮野豪侠的东北人的群像。他们身上蕴藏着“原始的野生的力”，他们是真正的大地之子和大地巨人！你还可以由被抗日队伍收编的土匪“煤黑子”（《遥远的风砂》）和

① 《科尔沁前史》，1940年12月1日《时代批评》第65期。

② 《萧军近作》第28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猎户的女儿水芹子（《浑河的急流》）的形象，强烈地感受到原始的强力和野性的美。萧军热衷刻画的人物也是那种雄强有力的大勇者，勇猛的铁鹰队长、坚毅的陈柱司令、刚烈的李七嫂（《八月的乡村》）和倔强的翠屏（《第三代》），都是如此。萧红的《生死场》，得到了鲁迅“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①的赞誉。骆宾基的小说更是出色地描绘了具有“闯关东”冒险经历的人物：“康天刚是那样一个愉快活泼的汉子，只要一见他就象从他身上得到生命力似的”；孙把头“是个背胸相当宽厚的汉子”，“满脸红红的，仿佛刚从热水浴盆里走出来的人”（《乡亲——康天刚》）。

民族矛盾、政治对抗、军事冲突、敌我斗争，构成了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这些内容本身就具有“崇高”的美质，激荡着雄健的阳刚之气。正如刘西渭在评析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时所指出的，“阶级斗争，还有民族抗战，是萧军先生作品的两棵柱石”，因此他的小说“孕育未来和力量”^②。只有经历过那种离乡背井、被迫流亡的人生磨难和情感体验，东北作家群才会在表现上述内容时，总是同时喷发着强烈的爱憎、难以抑制的激情、深重的苦痛和忧伤、绵绵不绝的思念与浓郁的主观情绪。端木蕻良“对着关东草原，比拜伦对着熄灭的希腊和荒淫的西班牙更灼热着沉挚的悲痛和爱”，^③他“抒情似的抒写着土地”^④。鲁迅在为《八月的乡村》作序时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

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

② 《〈八月的乡村〉——萧军先生作》。

③ 端木蕻良《我控诉，为了三千万被侮辱和损害的人民》，1946年4月25日《新华日报》。

④ 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1944年11月《万象》第4卷第5期。

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蝥蛄，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他们的这种创作心态，属于尼采所说的那种酒神狄奥尼索斯状态，是“整个情绪系统的激动亢奋”，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①

四

近、现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是在中国进入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侮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民抗敌御侮的一系列正义战争中，反侵略者的中国与侵略者的东西方列强之间，几乎横亘着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巨大鸿沟。正是这种巨大的文化历史落差，导致了近、现代中华民族的悲剧性命运，它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因此，中英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抗日战争，便不仅具有单纯的反侵略战争的意义，而且内涵着中外文化冲突、融汇的深远历史意义。近、现代中国置身于世界文化体系之后的基本历史文化处境，决定了中国的爱国主义文学，不但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鲜明倾向，而且更包含着文化批判与思想启蒙的民主主义的深邃内容。中国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的愚昧和残酷，悠久、停滞的民族历史，大一统的旧文化传统的日趋僵化和衰落，新生力量的缓慢生成和微弱发展，以及广大群众的落后的不觉悟状态，是每一个中国爱国者不能不正视的严峻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这就要求爱国主义文学，必须把反帝与反封建、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的双重历史任务

^① 尼采《悲剧的诞生》第320—321页，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